

试析伊和淖尔 M1 出土人物银碗*

王晓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副教授)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7.01.004

2010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发现的伊和淖尔 M1^[1],是近年来中国北方地区北魏墓葬考古的一项重要发现,尤以出土多件反映中西文明交流的器物而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对墓中出土的 1 件高浮雕鎏金人物银碗与其他 5 件类似器物的比较分析,着重讨论器物的设计风格、装饰特点和人物形象等内容,以此来探讨 M1 出土的这件银碗的产地及来源等问题。

一 人物银碗(杯)的发现

本文讨论的鎏金鍍花银碗(高足杯)类器物,系金属容器的一种,多以碗的形式出现,亦有少量的高足杯,主要特点是碗(高足杯)的内部素面,外部以 4 个忍冬纹(亦称“阿堪突斯花纹”^[2])配以 4~5 个人物进行装饰,人物面部普遍向左或向右 90°侧转,这类器物因为数量少、制作精而受到学界的重视。迄今为止,此类器物仅在大同南郊北魏首都平城遗址出土 3 件,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藏品 2 件,加上伊和淖尔 M1 新出土的 1 件,目前共发现 6 件。

这里首先按照这 6 件器物的发现顺序,对其具体情况做一介绍。

(一)鎏金刻花银碗

1970年,出土于山西大同轴承厂内工农路北侧的北魏遗址^[3]。

碗为侈口,颈微凹,腹壁至底成弧形,底圆,有同心圆凸线两道。器腹有 4 个对称分布的忍冬纹,忍冬的枝叶繁茂,每个忍冬纹中部有一束腰。4 个忍冬纹将器腹四等分,每一等分当中一圆环,在圆环内素地上捶雕一个半身像。头部侧面(相邻两个人像的侧身方向相反),胸部是正面,人像作扭头向侧方直视的姿态。面部表现为大眼、高度中等的鼻子、阔唇。头发呈波状,前覆额,后披于颈项。头顶有圈形冠,颈上挂连珠项链一条。上衣两肩各有 5 个圆圈,圈心有点,胸部散布细点,表示锦袍上的珠饰之类器物。银碗口径 8.5、通高 5 厘米(图一~五)。

(二)女性半身像银碗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70.5 号藏品(Bowl with female busts in medallions),出土地点不详,1970 年收藏^[4]。

碗的内部及剖面情况不详。碗的外部主要是人物图像和忍冬纹,具体情况是:4 个忍冬纹将整个碗面等分成 4 个部分,忍冬纹的线条粗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号:14BKG004)。

硬,忍冬的底部有一圆球,中心有点,每个忍冬上部左右两侧枝叶上各结一圆形果实;被平分的4个部分中各有一个圆环,而整个碗面的最中心亦有1个圆环,共计5个圆环(圆环有窄的连珠纹)。圆环之中各有1个女性图像,5个女性头像的面貌基本一致,可能是同一人,头侧向一边,最中心的头像转向右边,其他4个头像头侧转的方向左右两两相对;人物面部表现为高鼻、大眼、小嘴。头戴球形冠,冠后有飘带一条。头戴似金属状帽子,帽子上有两条连珠链,头上有10条辫形饰品或者辫子,4条垂于肩部(左右肩部各2条),4条垂于胸前,另外2条垂于脸颊。颈部细长,颈上挂连珠项链一条。乳房凸出,下部用类似莲瓣进行装饰。碗内部有题记。直径23.6~24.1、高8.1、厚0.62厘米,重1235克(图六、七)。

(三) 鎏金印花银碗

1988年,出土于山西大同南郊M107,编号M107:16^[5]。

碗为敞口,束颈,圆腹,圆底。口沿之下微内收,口沿下及上腹部各有连珠纹一周,两周连珠纹之间宽1厘米,中间光素无纹;腹部伸展4组忍冬纹,将腹壁四等分,每一等分之间



图一 大同轴承厂出土银碗

的小叶纹之上托起一个圆环,共4个圆环,每一圆环内各有一人头像。头像皆侧身,两两相对或相背,面部表现为鼻子高度中等(原报告上没有这几个图像的细部线图,照片也并不清晰,因此难以分辨,所以主要根据原报告进行描述),眼睛深陷,上衣均是V领,但形象各不相同。其中一人侧身向右,卷发遮耳及颈,相貌年轻。与之相对的一人头发较短,颅后发留至颈部,露耳,下颌胡须上翘。另一组向左之人长发卷曲,遮额及颈,相貌年轻,与之相对



图二 大同轴承厂出土银碗人像



图三 大同轴承厂出土银碗人像



图四 大同轴承厂出土银碗人像



图五 大同轴承厂出土银碗人像

的一人短发, 颅后发留至颈部, 露耳, 前额后倾; 圆底中部有两圈同心圆凹弦纹, 内圈素面内凹, 两圈之间用一种由两条小锯齿纹组合的纹饰分割成八等分, 每等分内的图案相同, 似为一忍冬纹小叶片。银碗口径 10.2、通高 4.6 厘米(图八、九)。

(四) 鎏金鍍花高足银杯

1988年, 出土于山西大同南郊 M109, 编号 M109: 2^⑥。

碗为敞口, 束颈, 圆腹, 高圈足。口沿下端稍内收, 口沿下及上腹部各有连珠纹一周。腹部有 4 组伸展的忍冬纹, 等距离分布, 将腹壁

四等分; 忍冬纹之间的四个空隙处, 分别有 4 个圆环, 环内各有一个侧面人头像。4 人的头像两两相对或相背, 鼻子高度中等, 眼窝深度亦中等, 头戴帽, 穿着圆领衣, 形象各不相同。一人侧身向左, 头戴鸟形冠, 长发卷曲, 披至后背, 耳下似有垂饰, 高颧骨, 鹰钩鼻, 穿着圆领上衣。与其相对的一人, 卷发遮额, 耳及颌, 头戴竖条纹小圆帽, 尖鼻, 尖下颌。另 2 个相对的人物, 一人头戴有帽檐的圆帽, 帽檐短而厚, 露耳, 帽下颈部露出卷发, 帽上有图案, 但图案不清。与其相对的一人卷发遮额, 耳及颌, 头戴竖向条纹状小软帽, 扬眉, 尖鼻, 尖下颌, 胡须上扬。杯



图六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970.5 号银碗



图七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970.5 号银碗

把高 1.5、杯口直径 9.3、通高 6.2 厘米(图一〇~一四)。

(五)高足人物银杯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2000.503 号藏品 (Footed cup with human busts in medallions), 2000 年入藏^[7]。

杯口沿下及腹部有两道连珠纹, 两道纹饰之间有两条凸弦纹。腹部连珠纹下为主图案: 4 个忍冬纹, 间以 4 个侧身人物像。忍冬纹的叶子巨大, 人物像在圆环内, 偏小, 但明显凸出, 浅浮雕状, 巨大叶子中部偏下有一束口。人物仅见一男性形象, 鼻高中等, 大眼, 头戴冠, 冠形制不清, 上身着圆领衣, 其他不详。通高 5.8(不包括足, 高 3.5 厘米)、杯口直径 8.5 厘米(图一五)。

(六)鎏金高浮雕人物银碗

2010 年, 出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伊和淖尔 M1, 编号 M1: 16。

碗为敞口, 圆腹, 圆底, 碗内部素面, 外部装饰复杂。口沿下有一周凸起的连珠纹, 其下高浮雕 4 个上半身人物像, 三女一男, 底部的中心为 5 个同心圆; 外腹部伸展四组忍冬叶纹, 将腹壁分成四等分, 每一等分之间的小叶纹之上托一个椭圆形环, 椭圆形环内各有一个半身人像, 高浮雕状, 凸出银碗表面 1~1.5 厘米。人像皆侧身, 每个人像侧身的方向与其相邻的两个人物像相反或相对。面部特征为鼻梁中等, 眼睛的深陷程度中等, 细长颈。三女子相貌年轻, 发式各不相同, 上衣均是 V 形领, 男子像呈中年相貌, 头发较短, 下颌蓄胡须。碗口径 14.2、高 4 厘米(图一六、一七)。

二 器物的分组

依据上述 6 件器物的忍冬纹纹样、人物形象及装饰特点, 可将这 6 件器物初分成四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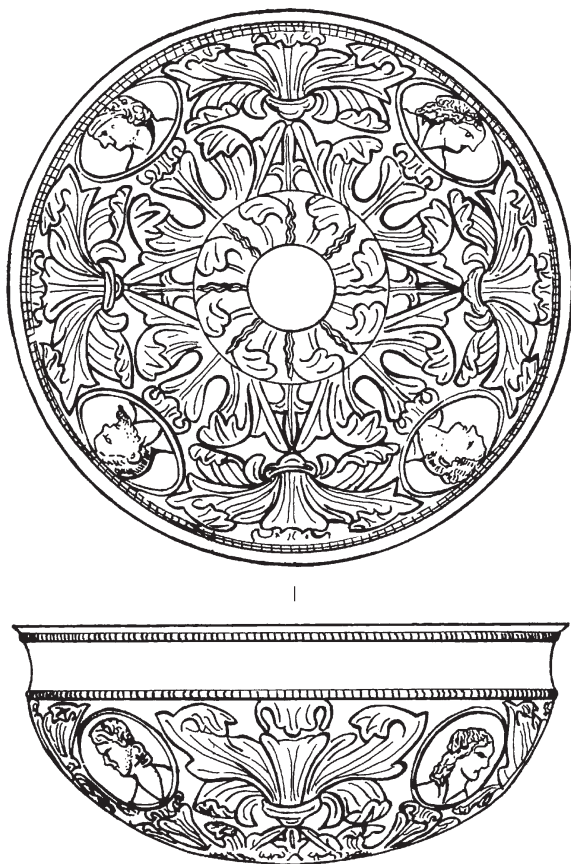
第一组: 大都会博物馆 170.5 号藏品。主要

特点为忍冬纹粗硬, 枝叶不翻转; 女性, 戴冠, 脑后飘带, 头上有辫形饰品或者辫子。

第二组: 大同轴承厂器物。主要特点为忍



图八 大同南郊出土银碗(M107: 16)



图九 大同南郊出土银碗(M107: 16)



图一〇 大同南郊出土银杯(M109:2)

全部为女性,且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人物头上戴冠,且脑后
有飘带,头上有辫形饰品或者辫子,这
是其他几组器物的人像所没有的;第
二组器物总体上跟第一组接近,特
别是忍冬纹的装饰图样基本相同,
人物也普遍佩戴帽子;第三组的两
件器物,忍冬纹纹样及线条细腻成
熟,呈现出程式化的特征,并且上
部的枝叶出现显著的翻转痕迹,束
口位置在中部偏下;第四组两件器
物的设计风格非常接近,可能是因
为时代发展的差异,两者略有区别。

冬纹粗大,枝叶不翻转;男性,戴冠。

第三组:大同 M109:2、大都会博物馆
2000.503 藏品。主要特点为忍冬纹柔软且程
式化,枝叶翻转,束口在中部偏下;人物戴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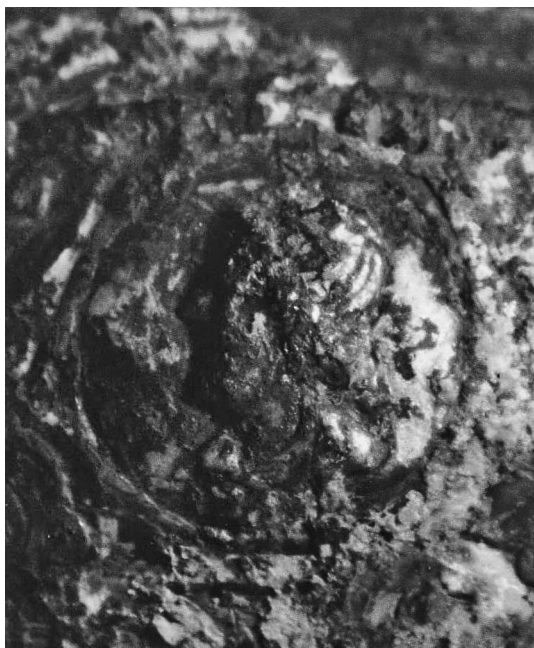
第四组:伊和淖尔 M1:16、大同 M107:16。
主要特点为忍冬纹柔软且程式化,枝叶翻
转,束口在中部;人物多不戴冠。

第一组器物与其他三组的器物明显不同,

以上四组共 6 件器物,有较为明
显的演变规律:人物的脸形由方形趋于瘦
长;颈部由有连珠串饰到没有串饰;忍冬
纹枝叶由不翻转到有显著翻转。

三 结 语

上述 6 件器物器形相似且制作风格接
近,应该有着相同或者相近的产地和来源。
大同轴承厂及南郊发现的 3 件银碗和银杯
最早见诸



图一一 大同南郊出土银杯(M109:2)人像



图一二 大同南郊出土银杯(M109:2)人像



图一三 大同南郊出土银杯(M109:2)人像



图一四 大同南郊出土银杯(M109:2)人像

报端。20世纪70年代起即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引发了连续讨论,但就其风格、产地等问题,孙培良^[8]、夏鼐^[9]、宿白^[10]、孙机^[11]、马尔萨克^[12]等中外学者们^[13]的观点不尽相同。

目前,多件类似器物的发现对于讨论它们之间的异同与变化规律,提供了更好的契机。

萨珊波斯帝国(224~651年)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及后继的拜占庭帝国共存时间超过400年;统治区域包括今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及中亚西南部,乃至印度的一部分。萨珊王朝被认为是伊朗或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其中一条贯穿萨珊境内,因此萨珊成为中国和西方罗马及拜占庭帝国之间交流的必经之路,它接受拜占庭帝国和中国的文化成果,也将自己的文明因素传播到这两个国家^[14]。

人物形象是萨珊银器上常见的题材^[15],其主要特点有:男性人物普遍蓄须,头戴球形冠(高等级人物),脑后多

有飘带,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颈部普遍佩戴连珠项链^[16]。女性有辫形饰品或者辫子垂于两侧。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55.57号^[17]、1970.6号、1994.402号藏品、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附近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雕像^[18]等均有此特点(图一八~二一)。第一组的这件银碗



图一五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2000.503 号银杯



图一六 伊和淖尔出土银碗(M1:16)

具备上述特征。根据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1970.5 藏品上的题字,有学者将它的年代定为 3~4 世纪,属于萨珊早期的制品^[19]。

第二组与第一组联系紧密,具有相同的产地和渊源,都具有连珠纹串饰,忍冬纹纹样没有程式化,上端的枝叶亦没有翻转。因此,我们认为它也是萨珊的制品,可以与第一组归为一类器物,只不过时代上可能晚于第一组,即 A 类银碗;至于第三组和第四组,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共同性,可以归为一类,即 B 类银碗。B 类银碗与 A 类银碗在整体设计风格上有一致的方面,暗示 B 类器物的设计是受 A 类器物即萨珊影响产生的,但是两类之间又有着明显差异性。如在人物的形象方面,A 类多方形脸,与传统萨珊人物接近;B 类多瘦长形脸,与希腊的人

物造型接近,且 B 类银碗的人物颈部普遍没有佩戴连珠串饰。在忍冬纹纹样方面,B 类器物上的忍冬纹纹样已明显程式化,上端的枝叶普遍翻转,这点与 A 类也不相同。因此,笔者认为 B 类银碗是非典型性萨珊器物。据马尔萨克(Boris I. Marschak)考证,大同南郊银碗 M107:16 的忍冬纹具有平边框和叶萼(花瓣下部的一圈叶状绿色小片),这些特征都是从古希腊时期 Megara 碗的风格直接继承过来的^[20]。

与萨珊联系密切,又具有希腊文化渊源的区域,笔者认为萨珊帝国的属国巴克特里亚地区^[21]与之最为契合。自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征服巴克特里亚起,巴克特里亚地区就开始使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希腊语,成了这一地区文明的唯一语言和官方语言。巴克特里亚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后,其新的统治者——贵霜人——最初仍继续使用希腊语,但很快改用希腊字母拼写本地语言巴克特里亚语,如贵霜钱币使用一种有尖角的希腊字母刻字。

巴克特里亚之后的统治者是 Kushano-Sasanians(贵霜—萨珊人)^[22]、Kidarites(寄多罗人)、Hephthalites(嚙哒人)和 Turks(突厥人)等。可见,希腊文化很早就渗透到这一地区,并成



图一七 伊和淖尔出土银碗(M1:16)



图一八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55.57 号银碗



图一九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970.6 号银碗



图二〇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994.402 号银碗



图二一 萨珊阿尔达希儿一世(Ardashir I)雕像



图二二 俄罗斯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藏嚧哒银碗

为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因此,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2000.503 号藏品出自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并非偶然。

综上,我们认为 A 类银碗是来自萨珊波斯的器物,时代约为 3~4 世纪;B 类银碗来自贵霜—萨珊王国,即巴克特里亚地区,时代约为 5~6 世纪。

贵霜—萨珊人之后,嚧哒人统治了该区域,因此嚧哒的同类器物上也可以找到类似风格。孙机很敏锐地注意到,俄罗斯艾尔米塔日博物馆的嚧哒银碗底部有两圈同心圆(图二二),人物也与大同南郊银碗(M107:16)非常接近,因此他推断大同的银碗应是嚧哒产品。孙机注

意的这两点的确是人物银碗非常重要的特征。另外,通过类型学分析,我们认为忍冬纹纹样的变化及布局也是应该被着重考虑的因素。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藏银碗的忍冬纹纹样大为缩小,只剩下 6 个很小的叶子分布在碗的边缘作装饰,这可能是该类银碗发展到晚期的一个特征。因此,我们认为艾尔米塔日博物馆藏的那件嚧哒时期银碗,时代要比大同及伊和淖尔 M1 出土的银碗略晚,但可能也是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产品。

据以上分析,伊和淖尔 M1 及大同南郊附近出土的几件银碗(杯),初步可以断定其并非典型萨珊波斯的产品。根据所做比对,这些器

物可能与贵霜—萨珊王国艺术联系密切,产地可能为萨珊的属国巴克特里亚地区。当然,要切实证实上述结论,还需要结合银碗的制作技术、工艺水平及矿产资源等相关背景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因此,下一步研究应在冶金考古及艺术史等方面进行探索。

萨珊王朝统治的区域,西自幼发拉底河,东到巴克特里亚地区。自3~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该区域的漫长时间里,萨珊控制了丝绸之路从拜占庭到中国的关键区域,因此,多种文明得以在此汇聚、流转。但是,在中国发现的这些器物,不一定是钱币或货物源出国的萨珊或拜占庭人亲自传播到中国的,活跃在商路上的粟特人、嚙哒人、突厥人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23]。

附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魏坚教授、李梅田教授、森谷一树博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李延祥教授,北京大学韦正教授,斯坦福大学丁爱博(Albert E. Dien)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日本MIHO博物馆稻垣肇先生,奈良国立博物馆井口喜晴先生,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孙志新先生等中外学者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金文娟绘制了线图,在此一并致谢。

- [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等《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 M1 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2] 即忍冬纹,一种叶子柔软发达的植物,最早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后来在希腊盛行,称之为阿堪突斯(acanthus),也有学者译做“蓂苔”叶,其后传入中亚和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忍冬纹成为我国各地北朝石窟主要的装饰纹样,见于同时期的各类器物上。
- [3]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图版 152 下,文物出版社,1972 年;奈良国立博物馆《丝绸之路·佛教美术传来之道》,第 104~105 页,(日)大塚巧艺社,1988 年;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
- [4] 资料来源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官网。
-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8 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29 页,彩版一一,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6]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 241 页,彩版一二、一三,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7] 资料来源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8] 孙培良先生最先撰文讨论大同轴承厂出土的鎏金鍍花银碗的来源问题,他认为该器物属于萨珊波斯产品,其上的人物与安息王朝钱币上的人物相同,可能来自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区,并且认为这件器物是北魏迁都洛阳前流入平城的。详见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 年第 9 期。
- [9] 夏鼐先生认为该器物是中亚或西亚输入的产品,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详见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 年第 2 期。
- [10] 1986 年,宿白先生在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词条时,将该银碗的年代定为 5 世纪末 6 世纪初。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 [11] 孙机先生认为该鎏金鍍花银碗与列宁格勒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所藏 5 世纪制作的嚙哒银碗相似,认为其可能是嚙哒制品。详见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 年第 9 期。
- [12] 俄罗斯马尔萨克先生认为大同南郊高足高浮雕人物鎏金银杯(M109:2)具有明显的希腊风格。转引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五章“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外来文化因素”,第 505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 [13] 1988 年,大同南郊高足高浮雕人物鎏金银杯(M109:2)赴日本展出的图录中,执笔者认为其可能是拜占庭的产品。详见奈良国立博物馆《丝绸之路·佛教美术传来之道》,第 104~105、193 页,(日)大塚巧艺社,1988 年;原书标注的器物名称为“银制人物唐草纹杯”,时代为 386~534 年。我们通过日本龙谷大学徐光辉教授就伊和淖尔 M1 出土银碗请教过日本学者,MIHO 博物馆稻垣肇先生认为伊和淖尔 M1 出土的银碗制作风格类似于 3~5 世纪的阿富汗等中亚地区萨珊银器,且比 1988 年大同南郊同类器要早,略晚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2000.503 号银杯;奈良国立博物馆井口喜晴先生认为伊和淖尔 M1 出土银碗属于萨珊。
- [14] 张绪山《萨珊波斯帝国与中国—拜占庭文化交流》,

- 《全球史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15] R. Ghirshman, *Persian Art: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Dynasties*, BC 249–AD 651, Golden Press, 1962; John Curtis, *Mesopotamia and Iran i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British Museum Press, 1st Edition, 2000; R.W. Ferrier, *The Arts of Per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89.
- [16] 关于萨珊器物普遍具有飘带和连珠纹的特征，意大利学者康马泰也持类似观点，参见康马泰 (Matteo Compareti)、毛民译《萨珊艺术之最新考古发现与丝路胡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康马泰《阿旃陀和巴格石窟壁画中的中亚装饰艺术因素研究述评》，《艺术史研究》(9)，第461~47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Matteo Compareti, Some examples of Central Asian decorative elements in Ajanta and Bagh Indian paintings, *The Silk Road* 12 (2014), pp. 39–48。
- [17] 资料来源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官网。
- [18] R. W. Ferrier, *The Art of Per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 London, 1989, p64, figure 7.
- [19] Christopher J. Brunne, Middle Persian Inscriptions on Sasanian Silverware,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9 (1974), pp. 109–121.
- [20]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2004), Boris I. Marschak, items 64, pp. 155。以上学术信息，承李梅田教授的好友斯坦福大学的丁爱博 (Albert E. Dien) 教授来信惠告。
- [21] 巴克特里亚地区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以北地区，主要由今日阿富汗北部、塔吉克南部和乌兹别克西南部组成。
- [22] 3世纪萨珊人灭亡了庞大的贵霜帝国，并吞其部分领土，包括巴克特里亚 (吐火罗斯坦)。该地区后来成为贵霜—萨珊小王国的一部分，以后又是辽阔而强盛的萨珊帝国本身的组成部分，这个帝国从中亚西南部一些地区和阿富汗斯坦一直延伸到外高加索、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比亚的部分地区。以上内容详见[俄]B.A.李特文斯基主编、马小鹤译《中亚文明史》(第三卷)，第一章“历史导言”、第四章“贵霜—萨珊王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 [23] 孙机先生认为我国发现的近1200枚萨珊银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可能是经嚙哒人、粟特人或突厥人之手传入的，并非均直接来自波斯，详见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荣新江先生也指出，大概正是因为从北朝到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被粟特人垄断，所以我们在史籍中很少看到波斯商人的足迹，波斯商人在唐朝时期更多是活跃在东南沿海，而非敦煌、吐鲁番，在北方丝路沿线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和少量的东罗马金币，应该是粟特人贸易的印证，而不是钱币源出国的波斯人和拜占庭人。详见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未名中国史》上册，第189~1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荣新江《从撒马尔干到长安——中古时期粟特人的迁徙与入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杨冠华)